

■精准扶贫蹲点调研·贵州遵义篇

从“荒茅”到“花茂”的绿色扶贫

本报记者 赵征南



花茂村，原名“荒茅田”，即荒芜之地，曾经是一个“出行难、用电难、看病难、上学难、增收难”的典型贫困村。2014 年以来，花茂村以富在农家、学在农家、乐在农家、美在农家即“四在农家”

为依托，实现农旅文融合、一二三产融合、产业与生态融合、人与自然融合，走出一条绿色的精准扶贫之路。

2015 年 6 月 16 日，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地处贵州遵义的花茂村，与村民亲切交谈。他对村民说：“看到每个人洋溢在脸上的愉悦表情，知道你们过得不错，这里的脱贫致富是比较成功的，你们对党和政府是拥护的。群众拥护不拥护是我们检验工作的重要标准。党中央制定的政策好不

好，要看乡亲们是哭还是笑。”

从那以后，花茂村的发展又上了一个新台阶。截至目前，花茂村的人均收入达到 14119 元，比 5 年前的 6478 元翻了一番还多。

初夏时节，本报记者来到花茂村，走进产业园区、农家乐以及贫困户的家中，亲身感受那“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”的田园气息，听花茂人讲述精准扶贫政策给他们的生活带来的可喜变化。



花茂村以“四在农家”为依托，走农、旅、文融合的脱贫致富路。

唐正摄



“红色之家”已成为来花茂村的外地游客必去的景点。



母先才坚守着花茂村最后的土陶作坊，如今撑起一片天。

早上六点，天上的星星还未退场，水塘的青蛙呱呱地叫着，“红色之家”农家乐老板王治强就早早地起床，再晚，菜场最新鲜的农家菜就要被抢光了。

“红色之家”被水田三面环绕，已有村民穿起胶鞋，弯下腰，在田中插秧。晨曦中，王治强发现了郑思群的身影，就跟她打招呼：“那么早就开始干活？”

“端午前后好插秧。我这赶紧忙完了，还得回去换身衣服，不耽误 8 点准时上班。”郑思群低着头回答，丝毫没耽误手中的农活。

乡村需要呵护才有乡愁

郑思群是“红色之家”聘请的工人，原本在外打工，为了方便照顾老人和孩子，她回到花茂，犁起荒废多年的土地，每个月在农家乐还有 1000 多元的工资。现在，她家已盖起了两层新房——“小青瓦、坡面屋、转角楼、三合院、雕花窗、白粉墙、穿斗枋”，典型的黔北民居。

在青山绿水之中，陪着老人和孩子，住着古朴的民居，遵从“端午插秧”的时令，这不正是农村人特有的生活吗？

2015 年 6 月 16 日，沿着土墙和木栏相伴的乡村小径，习近平总书记边走边询问当地脱贫致富情况。看到鲜花盛开，道路两旁的房子干净整洁，他有感而发地说：“怪不得大家都来，在这里找到了乡愁了。”

“乡愁是需要呵护的，需要从基础设施开始，科学地打造。否则，脏乱差的乡村哪来乡愁？”王治强说。

“发展乡村旅游，生态是一大重点。”花茂村党支部书记潘克刚说，现在，花茂村不但有 15 个垃圾箱和 99 个垃圾桶，还有 10 座固定式永久性垃圾收集池，垃圾车、手推车已覆盖全村，实行定期收集垃圾，转运到垃圾填埋场进行填埋处理。与此同时，花茂村还通过改水、改厕、改灶、改圈，对每家每户进行庭院绿化整治，并科学划定水源保护区，启动生态修复项目，完善村级排污管网，建设农村污水生态湿地处理系统和集镇“垃圾中转站”，将不乱丢垃圾、不乱晒农作物等美丽乡村举措列入乡规民约中。

受惠于花茂的变化，王治强如今的农家乐开得红红火火，一到周末或是节假日，近 200 个座位不提前预定都没位了，农家乐的“甑子鸡”成了小有名气的招牌菜，这可把年过五旬的他累得够呛。

上午十点，洗完菜的王治强才有时间坐下来吃早饭，两三个红油馄饨刚下肚，第一波游客就到了。他们除了在家家乐留影，还争相邀请王治强讲讲当初总书记来“红色之家”考察的故事。

此时，一个被淘气孩子“折磨”得焦头烂额的父亲过来问王治强，有没有能让孩子安静下来玩的地方。王治强用手指了指正前方，陶艺文化创意一条街。甑子鸡制作时盛放土鸡的瓦罐，就在那里生产。

母先才的陶艺吧总共 40 多个座位，如今 4 排中已坐满 3 排，都是大人带着

孩子，围在电动转盘边，跟着正前方踩着传统石盘的母先才一起，制作土陶。

陶艺吧更多的是为了宣传陶艺文化，其收入只是母先才收入的零头，他的主要收入还是土陶瓦罐的定制化销售。围绕乡村旅游，母先才将主打产品由传统的罐、缸升级为工艺品，像一个小花瓶，成本不到大缸的十分之一，做赚了价钱最多可以达到大缸的 5 倍。现在，母先才不仅还完了数十万元贷款，还新购了一辆越野车。

撑到“最后”的土陶迎来春天

母先才从 13 岁起学习陶艺，是家族第四代嫡传弟子。他告诉记者，花茂土陶制作技艺起源于清代光绪年间，主要有缸、罐、钵、坛等几个大类几百个品种，没有模型，全都在手上取巧。一个土陶从软泥到成品要经过制陶泥、做毛坯、上釉、烧制等 10 多道工序，初步掌握没有三五年功夫不行。

花茂人的乡愁，和这些瓶瓶罐罐密切相关。黄泥巴、褐瓷罐、土坯窑、釉香绕，记忆中的醋罐子、甑子、倒卜坛、坛钵、油盐罐、菜坛子、水缸子几乎全是那种瓷质和釉色，散发着古朴而温润的光泽，随处可见。

花茂村第一次致富梦也从土陶兴盛开始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是花茂土陶发展的黄金期。当时，全村人不是做土陶，就是卖土陶，80%以上的人以土陶为生。产品主要为 40 公里外的仁怀各酒厂，特别是为贵州茅台酒厂生产酒缸、酒瓶、酒坛等器具。

然而，到了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，由于花茂土陶制作工艺落后于时代，不能满足发展需求，供需严重脱节，土陶作坊逐渐萧条。“我们花茂曾是仁怀各酒厂的主产区，可后来这个市场逐渐被四川、湖南的产品占领，他们做的酒坛容量最大可达 1 吨，我们最多只能做出 250 公斤的。这条主要收入来源就断了。”母先才说。

在土陶作坊纷纷倒闭后，花茂村试图依托周边的煤矿，带动村民致富。住在枫花公路与枫纸公路交叉口的牟先武对这种发展思路很是反感。“发展运输业，整个村子都尘土飞扬，白天和黑夜，大卡车轰隆隆的声音响个不停，睡都睡不好。”他说。

还有部分村民走进环绕村子的青山，将绿树砍伐后卖给煤矿使用。后来，随着国家对森林保护力度的升级，花茂村还是果断斩断这条粗暴发展的路。

没办法，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，大量的花茂青年走出山沟外出打工，王治强也是其中之一。他经历过“一年只有过年、端午、鬼节三次‘打牙祭’”的苦日子，也有过“初中交不起学费而辍学”的伤痕，预感陶艺学徒没出路，他向邻居借了 5 元钱，辗转来到广东，学习建筑施工技能。后来，有了一技之长的他回到遵义，在市区承包工程，他很努力，生意越做越红火。

2014 年，花茂村以“四在农家·美丽乡村”升级版建设为总抓手，推动农旅文一体化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。时任遵义县委书记曾瑜说，把农村一房一床、一砖一瓦、一草一木、一山一水转为农民增收致富的要素。

王治强敏锐捕捉到商机，他决定花 5 万元，翻修老家宅院，回家开农家乐。这一想法遭到了家人的强烈反对。

妻子跟他说：“花茂连个风景区都没有，再说我们这不靠马路，开农家乐哪有人来？我想把家修成大别墅。”

他没注意听，自言自语：“可能 5 万元还不够，改建加上运营，估计要 10 多万元。”

“不行。端盘子什么时候才能端出 10 万元？”妻子生气，却拗不过，就拉着儿子一起劝。

儿子跟王治强说：“现在国家建设力度这么大，在城市搞工程不是挺好的吗？开农家乐能赚多少钱？”

王治强回答：“离家久了都恋家。有了机会，还是在家发展好。你看吧，花茂的青山绿水，家里的美丽田园，将给我们带来切实的好处。”

与此同时，烟火未辍。花茂仍旧有村民朴实实地坚守，传承着先辈的土陶技艺。从 2000 年到 2015 年，母先才陪着花茂村最后的土陶作坊以“唯一”的勇气坚持经营，并不断改进工艺。

终于，他赶上了好时候。县领导来花茂考察时如获至宝，将陶艺一条街列为苟坝会议红色旅游沿线发展的重点项目。“当时，县里镇上帮我落实提档升级所需的贷款后，有领导跟我说，再过两年，你就能在床上数钱了。”母先才说，“可后院堆满的坛罐已滞销半年，杂草齐腰。我觉得他们是没看到我的经营‘惨状’，我也不好意思说，就当领导在激励我吧。没想到，致富梦成了现实。”

大棚里“种”出一个公园

“在总书记考察之后，我们村的旅游更火爆了。”牟先武说。

去年，在外务工回家过年的牟先武看到马路上如同赶集一般的人潮。再想想自己上初中的孩子和身患疾病的母亲，决定留在家中，利用家对面就是陶艺一条街的优势做文章。他将前门院坝改成洗车场，后墙打开升起小吃店，夫妻两人相互照应，生意不错。

如果既没有王治强这样的决心和思路，没有母先才的特色手艺，也没有牟先武家这样的绝佳地理位置，其他村民要如何致富呢？除了旅游、文化之外，他们还重点发展农民的老本行农业，区别于传统农业的现代高效农业。“花茂村委员会主任彭龙芬说。

在花茂村的最南边，有一个大棚里的公园。在 13000 平方米的空间里，巨型南瓜、五彩椒、红玉西瓜、碰碰香、巨型丝瓜、亚腰葫芦等 180 多个蔬菜、花卉品种，各种形状、各种色彩，不断冲击着游客的眼球。这里集新品种试验和展示、实践教学、旅游观光等功能为一体。2015

年 7 月对外开放。“我们过去只晓得大棚用来种田，真是开了眼界。”彭龙芬说，第一年门票收入就 300 多万元，比外面贵 3 倍的小黄瓜，卖得好得不得了。

花茂村完善“公司（园区）基地合作社村村委会农户”利益联结机制，通过土地入股、平时务工、年终分红，带动农民发展产业脱贫致富。九丰农业园区投资超亿元，将建成智能温控大棚、办公培训中心、深加工车间、生态餐厅等设施 15 万余平方米，打造核心蔬菜基地 300 亩，露地蔬菜示范基地 3000 亩，带动周边种植露地蔬菜 2 万余亩。

“总书记考察九丰园区时说：‘我到这里来，主要就是看中你们对农民的带动作用。’现在，明显感觉村民打牌的越来越少，做事的人越来越多。”九丰公司副总经理闫京罡告诉记者，如今园区内近 200 名员工中，除了十几名技术员，全部聘用经过培训的本地村民，这对企业减轻人力成本而言，也有好处。

贫困户吴仕巧在园区中，一条一条地拉扯丝瓜缠绕的吊线。她以前从未见过吊线，如今几秒钟的时间，她就能操作一条吊线。

中午下班，她立马回家，没空休息，就要给下肢瘫痪的丈夫做饭。她的家非常简陋，厅堂空空荡荡，只放着一张桌子、几条板凳和一台饮水机。2006 年，丈夫因病倒下，瘦小的她承担了全部家庭重担，她的脑海中只有一个念想——赚钱。买药帮丈夫缓解病痛要花钱，儿子高中学习生活也要花钱。为了多挣钱，再苦再累的活她也愿意做。2014 年，读初三的儿子回家，不经意间发现吴仕巧的腿已一瘸一拐，方才知道，长期在工地接活对吴仕巧的身体带来多大负担。儿子求她：“妈妈，我不读书了，我出去打工，我要帮你照顾爸爸。”

“不行，你爸爸和我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，你要好好读书。”吴仕巧说。

当年，她家被列为精准扶贫帮扶对象，儿子的学费有了着落，且按照村里“脱贫不脱政策”的要求，儿子将来依然会获得学习上的资助。吴仕巧本人也由于九丰农业的进驻，获得了一份较为轻松的工作，每个月有近 2000 元的工资。一家人的生活渐渐有了起色。

对贫困户雷文碧而言，在九丰工作，让她种植理念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“我们以前哪有育苗的工夫？就往地里洒些种子，‘靠天收’。而在九丰，有专门的育苗中心，可一次性育苗 90 万株，年育苗能力达 800 万株。现代化育苗，成活率高，抗病力强，产值涨了很多。”她说，“还有蔬菜嫁接，那么短，那么细，但他们就是做到了。我跟我跟他们好好学，将来有机会回家自己试试。”

“毕竟是企业，原本我们的技术是对内保留的，但既然要带动，就要对农民培训，植入现代种植理念。若是优秀员工将来能独当一面，有的走出园区，到更广的田野发展现代种植，将带动更广大群众增收。”闫京罡说。

这也正是花茂村期待的。

专家访谈

当减贫遇上环保 绿色扶贫是最好黏合剂

——访北京大学贫困地区发展研究院院长雷明

文汇报：在贵州，不少山区农村都将农业、旅游、文化等绿色产业作为扶贫的主要方式，推进“大生态”下的“大扶贫”。在您看来，这些绿色扶贫的举措有哪些重要意义？

雷明：对贵州而言，当地山水秀丽，可与此同时，遍布喀斯特地貌的贵州又是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地方。发展和生态这两条底线，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都要坚守。

扶贫体现了代内公平，环保体现着代际公平，如何找到两者的平衡，一直以来，这是全世界贫困地区都要面临的挑战。多年以前，我在西部某山村调研，当地依托富集锌矿石发展经济，家家户户都用小炉子炼锌，污染很大。我跟一个老太太说，她的回答是，把炉子拿到屋里，关上门窗，不污染别人，可以吗？我感触很深，真断了生产初级资料这条路，他们饭都吃不下了。

现在党中央提出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理念，而绿色扶贫则是这一理念的重要体现。这意味着“绿色”“生态”从被动的保护对象，变为创造价值的生产力要素，和其他要素同等对待，从而解决“代际公平”和“代内群众发展”的问题。

与此同时，“绿色扶贫”也有了市场土壤。过去，这个市场只有供给，却较少有需求，因而造成地方守着青山绿水却没饭吃的境地。如今呢，随着大环境的变化，带来了这种需求。过去，我们是短缺经济，除了物质需求，基本没有其他需求。现在，看似没有办法创造价值的生态环境，却突然能够创造收入，为什么？因为我国到了这个社会阶段，有很多富裕地区和先富群体出现了，城市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，他们想体验、感受乡村或者说小时候的回忆，生态产业、特别是旅游，成了人的基本需求。发达地区经历早期的快速发展后，在生态以及乡愁上弱化了，百姓要找到新的市场供给，恰恰这是贵州极为富足的一块，是贵州重要的后发优势之一。

文汇报：推进绿色扶贫的关键因素有哪些？

雷明：绿色扶贫就是充分利用自然生态资产转化为经济效益，并不断提升其附加价值，转化成老百姓的可支配性收入。

关键之一，就是要找到好的转化方式。这个方式，可能各地都不一样。必须因地制宜，但主要有两点：一是“靠山吃山”，不同于过去简单粗暴地“吃”，那是暴殄天物，一时吃饱后还吃空，而是要科学合理地“吃”，从“卖石头”到“卖风景”。“山”包括自然景观和文化民俗，是当地特有的资源，要变成金山银山，绿色产业一定要更富有内涵。主要措施包括自然景观的打造和传统文化的切入。二是“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”，若是一时间没找到转化方式，不妨“以空间换时间”，绿水青山是贫困地区的安身立命之本，留住它，就留住了希望。毕

竟“原汁原味”是全世界都稀缺的资源，越沉淀越吃香。

第二个关键是重视产业的作用。绿色扶贫决不能抛弃产业，而是发展绿色产业。产业拆分开来看先是立“产”，有提供产品的能力，不管是企业带动，还是农民自己搞，要有产品。但有了产品行不行，供给过剩了怎么办？所以要成“业”，业态。任何一个产业都不是个体支撑的，要有上下游，要有相关的主体共同配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。比如产业园区，它就有这种集聚作用。节省成本的同时防止同质化。

与此同时，要注意好有关“精准”的三个维度：不仅要准，还要精；不仅要精，还要有可持续性——首先要找到准确扶贫对象，提供准确的致富途径；其次要精细地引导和管理，要提供相应的培训和指导；最后，若卖不出去，后续肯定难以坚持，所以还要帮其扩大销路，让致富途径持续下去。

文汇报：在贵州采访时，部分村干部表示，现在越来越多的乡村都在搞农旅文带动扶贫，将来可能游客分散流失，他们感到很大的竞争压力，对于这种压力，如何化解？

雷明：在游客持续涌入时便有这种危机意识，这很不容易。确实，如果差异化做得不好，的确可能造成客源流失。

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关键还在于政府。政府要有统筹规划，各区域不能脱离整体，同时也要差异化安排。政府要依据产地优势，将特色做起来，“人无我有”“人有我优”，将特色做到极致；在制定旅游发展规划时，也要根据市场需求，引入企业，以相关大户为主体；还要改变“好酒不怕巷子深”的老观念，主动出击，做好品牌推广。

文汇报：在农村扶贫中，如何提高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？

雷明：我们过去说，扶贫要扶“智”，就是提高贫困户的综合素质，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。其实，还应该包括扶“志”，一种自我努力的志气。在农村，可以用乡规民约等农村特有的方式，去激励、约束，营造一个让有劳动能力的人以奋发向上为荣，不敢、不愿偷懒的环境，形成思想观念的转变。当然，在调动群众积极性方面，最关键的还是让好政策精准落实到每一名贫困户的身上，带动他们自主脱贫。

在扶贫这件事情上，基层干部的角色和群众不同，群众是自愿，但干部承担的是责任和义务，必须有积极性，胜任不了就该让更出色的人来干。扶贫很难做，但你坐在这个位置上，就不要抱怨，忍住委屈，要有奉献精神。当然，我们平时也要创新体制机制，更多地关心、爱护和激励基层干部，为他们创造好的工作条件，提高他们在扶贫工作中的积极性。



九丰农业园区技术员对村民进行技术培训。

(九丰公司供图)



吴仕巧整理丝瓜田的吊线。(除署名外，均本报记者赵征南摄)